母国规制演化视角下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趋势特征与未来展望*

龙晓柏　杨　莉

[摘要] 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开放型规制政策是当前海外直接投资（ODI）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支撑。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海外直接投资（ODI）规制经历了三个演化阶段，规制范式已从限制型规制、便利型规制逐渐演化为鼓励型规制。本文对我国海外直接投资（ODI）发展阶段进行了客观判断，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演变特征与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的“U”形曲线大致相似。从中长期发展前景来看，我国海外直接投资必然经历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转型过程。针对全球经济新形势，我国应树立“投资全球”的国家规制战略，完善海外直接投资的国家规制机构体系，实施多元化空间规制布局战略。

[关键词] ODI；母国规制；演化特征；未来展望

[中图分类号] F30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12X（2021）—01—0143（07）

[作者] 龙晓柏，副研究员，博士，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研究所，江西南昌　330077

杨　莉，教授，博士，外交学院国际经济学院，北京　100037

一、引言

国外学者对发展中国家海外直接投资的演化轨迹及规制机理的相关研究较早。历史上，发达国家一直是海外直接投资（ODI）的输出国，而发展中国家则是输入国。因此，传统上，跨国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发达经济体向经济转型体的资本流动。直到20世纪70年代，开始有学者聚焦于发展转型经济体的海外直接投资（ODI）研究。[1~3]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全球经济的高速增长及经济一体化发展，发展中国家的全球竞争性跨国公司的海外资产有了显著增长。有大量的研究表明，自1997～1998年以来亚洲大多发展中国家转型为净资本出口国，[4] 特别是自2000年开始，有关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ODI）有了更多关注。[5] Randall Morck et al.（2008）认为，近年来中国海外直接投资规模激增的主要动因在于政府致力于拓展海外经济的规制意愿，以及母国开放型的公共规制激励政策。[6] Ken Davies（2010）指出，由于中国政府近年来逐渐改进传统的规制方式，开始对海外投资实施放松的规制政策，大力鼓励企业“走出去”，中国海外直接投资（ODI）增速加快。[7] Carlos RodrÃguez & Ricardo Bustillo（2011）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海外直接投资（ODI）已成为其融入全球经济的重要规制战略内容。[8] Karl P. Sauvant et al.（2013）提出中国海外直接投资（ODI）的规制框架服务于两个目标：帮助中国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和协助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发展努力。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规制范式取向已从限制、便利和支持海外直接投资演变为鼓励海外直接投资。[9] Sarmiza Pencea et al.（2014）指出，受中国全方位“走出去”规制战略影响，中国近年来在中东欧的ODI增幅明显。[10] Peter J. Buckley & L. Jeremy

* 基金项目：江西省“十三五”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一带一路’下高质量推进中国企业国际化研究”（19YJ05）；外交学院“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重大课题“在非中资企业在非洲城镇化进程中的机遇研究”（3162019ZYKA02）。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Clegg et al.（2018）基于回溯性分析认为母国规制因素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ODI）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11]

国内有诸多学者基于母国规制视野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演变特征及 ODI 发展阶段判断进行了丰富的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谢岷（1987）认为，发展中国家生产国际化是二战后世界经济发展变化过程中一个积极的现象，中国参与国际直接投资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12] 鲁桐（2003）基于邓宁的投资发展轨迹理论分析，认为中国海外投资正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即邓宁所指的第三阶段初期。[13] 张茉楠（2011）认为，2010 年我国人均 GDP 已达到一定阶段，进行投资阶段的转变具有内在的必然性，我国正处于对外资本输出大幅增加的发展时期。金芳（2016）提出，金融危机后中国迅速崛起为全球资本供应的新兴力量，海外投资的大国地位日益显现，应加快培育竞争合作、互利共赢的海外投资生态规制政策。[14] 李洪亚等（2017）认为，所有制改革为中国海外直接投资（ODI）提供了制度保证，是经济转型过程中促进中国 ODI 扩张的一种机制。[15] 李琛等（2019）发现，政府经济规制行为能显著促进中国地区 ODI 增长，东部地区比中西部具有更为明显的促进效应。[16]

二、我国海外直接投资规制的演化历程

1. 第一阶段（1979～1998 年）：“双缺口”下限制型规制特征明显，规制政策改革进程相对缓慢

20 世纪 70 年代末，我国国民经济基础薄弱，在典型的储蓄短缺和外汇短缺并存的“双缺口”约束背景下，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规制战略理念是鼓励吸引 FDI、有限度许可中国企业 ODI。

1979 年，在国务院制定的十五项经济性战略规制改革方案中，第一次规定允许出国投资经营企业（第 13 项措施），国务院开始许可外经贸部所属的部分国有贸易企业和经济技术合作企业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这期间海外投资的主要目标包括：补充国内稀缺的自然资源；获取并转移海外技术回国；增强中国企业出口的机会；通过海外企业“干中学”强化中国企业的管理技能；推动我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友好合作发展的、针对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援助项目。到 1983 年底已有 100 多家中国企业在海外设立了分支机构（主要设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如中国对外贸易运输总公司（Sinotrans）1980 年在美国开始设立子公司，中国五矿（MINMETALS）在英国等开办了分支机构。

但针对 ODI 的正式改革性规制框架迟迟尚未明确，我国第一部有关 ODI 的政府规制文件到 1984 年才颁布，1985 年我国对 ODI 审批管制的主要基本规制框架才初步确定。这一阶段海外直接投资规制总体以限制型特征为主，如强制规定所有在海外投资所得的利润必须全部返回国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982）。1991 年国家计委有关加强海外投资项目管理的规制文件认为我国尚不具备大规模到海外投资的条件，企业的海外投资应侧重于利用国外的技术、资源和市场以补充国内不足。

从这一规制时期的演变进程看，在国家经济实力偏弱的背景下，虽然当时我国人民币估值处于高位，但注重引进 FDI 的发展战略和严格规制的外汇政策使得我国海外投资规模在低水平位置徘徊。该阶段的战略规制模式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已经显现出一定的局限性，严重抑制了中国在全球范围内配置海外经济资源的潜力。

当然，为适应 20 世纪 80 年代末我国“进口替代”向“出口替代”对外经济政策的转型，我国开始在部分领域放松对海外投资的规制，如鼓励以实物形式的海外投资，尤其 1992 年在新一轮的经济改革推动下，ODI 已经正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组成部分，各级地方政府开始致力于推动我国企业海外经营活动并鼓励企业在海外设立机构。但，在 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下，外经贸部开始严控海外投资的审批程序，强化对海外投资项目的监管，这项规制举措得到了国家外汇管理局的业务支持，即在 1998 年暂停对海外投资项目外汇使用的授权。

2. 第二阶段（1999～2007 年）：海外投资规制开始具有全球战略视野，以鼓励型规制为主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海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国际、国内宏观经济环境发生了很大转变，尤其中国的“双缺口”问题已逐渐演变为储蓄过剩和外汇过剩的“双过剩”格局。中国开始制定并实施“走出去”战略，规制战略导向从限制海外投资逐渐向放松海外投资转变。

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1999 年中央政府提出了“走出去”战略，特别提出促进轻工业部门如纺织、电子等行业到海外投资布局，国务院出台了《关于鼓励企业开展境外带料加工装配业务的意见》（国办发〔1999〕17 号），外经贸部为此通过实施政府补贴资助支持政策选择性地鼓励 33 家国有企业（其中 13 家为电子消费类企业）到海外投资。国家“十五”规划进一步明确，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支持有竞争力的企业实现国际化经营，到境外开展加工贸易或开发资源，健全和规范国内企业到境外投资的监管制度。“走出去”战略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创造了宽松的制度环境，最明显的是推动国有企业“全球化”，这期间有 512 家国有企业被确定为重点海外投资支持企业。

加入 WTO 后，中国海外投资政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按照 WTO 入世协定，中国需对 FDI 实施国民待遇原则，中国企业面临巨大的国内竞争压力。为应对国际化竞争，不少中国企业尤其是非国有企业开始寻求海外投资，这为中国 ODI 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源。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采取了多项激励性规制举措促进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第一，海外投资审批流程和规制权限已经分散到省级地方政府（需要在国家层面批准的仅有在指定的 7 个国家投资情形）。第二，政府强调市场力量的调节作用和投资企业的海外管理能力，简化了可行性研究作为审批规制的必备文件材料。第三，放松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控制性规制。第四，企业不再需要在国家外汇管理局进行抵押存款，允许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筹集资金促进海外投资。

3. 第三阶段（2008～2019 年）：深化全球化规制视野，高质量与规模增长目标相互耦合型的政府规制战略

2008 年以后世界经济开始经历金融危机挑战，中国国民经济受短暂冲击后综合实力在国际地位格局影响快速提升，同时随着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流量的急剧波动拉升，海外直接投资规制战略向宽领域、多视角深化转型。在这段时期，我国着重鼓励海外直接投资与国际接轨，研究和借鉴国际组织、多边金融机构采用的跨国投资原则、标准和惯例，注重海外投资产业价值链的转型与环境生态规制的要求，努力支持多样化的海外投资模式。

为完善海外投资的规制服务体系，按照国家确立的“走出去”战略目标和任务，有关部委强化了对外投资国别产业指引和东道国政策的规制服务，如商务部等部门发布的《对外投资国别产业指引（2011 版）》推荐了重点东道国的最新优先引资领域和东道国产业投资差异性规制政策。2015 年国务院在《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中提出，政府应加强统筹协调，制定发展规划，推动装备、技术、标准和服务“走出去”。2017 年国家进一步出台了关于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性规制文件。

与此同时，为高质量优化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空间布局，深化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分工合作，夯实海外直接投资的实体产业合作平台。2013 年 12 月，商务部、国家开发银行出台关于支持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建设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2015 年 3 月，国家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基于“共商、共享、共建”原则提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和对外投资规制框架，为我国新一轮深化 ODI 全球空间布局提供了新的战略契机。

三、对当前我国海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的判断

1. 人均海外直接投资发展规模的总体水平

从人均海外直接投资的规模看，虽然中国海外直接投资人均流量水平 2013 年开始就超过了发展中国家（地区），到 2019 年达到 81.69 美元/人，但仍然低于世界 181.63 美元/人的平均水平，更弱于发达经济体，中国海外直接投资人均水平规模还有大幅的提升空间。

2. 海外直接投资流量与人均国民经济水平之间关系的发展阶段判断

英国经济学家邓宁（Dunning，1981、1986）运用聚类分析方法研究了海外直接投资流量与母国国民经济水平（人均国民生产值，GNP）之间的发展趋势关系，[17,18] 并根据投资发展路径（IDP）理论预测了不同经济禀赋条件下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轨迹。IDP 一般可分为 4 个阶段：第 I 阶段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低于 400 美元，此时母国吸收少量的外资（FDI），同时几乎完全没有海外直接投资，海外 OLI（所有权－区位－市场内部化优势）无任何比较优势，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大多为贫穷型发展中国家；第 II 阶段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位于 400～1500 美元，母国外资（FDI）开始增长，但海外 OLI（所有权－区位－市场内部化）优势仍然明显缺乏，海外直接投资流出额非常少，投资净流出为负数且负值数逐渐扩大；第 III 阶段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处于 2000～4750 美元，海外直接投资增长开始快于外来直接投资（FDI）的流入，净投资流出仍然为负数但负值数逐渐收窄；第 IV 阶段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处于更高水平的国家，其净投资流出已转为正数，OLI（所有权－区位－市场内部化）优势越来越明显，如美国、瑞典等欧美发达国家，成为全球主要的国际资本净输出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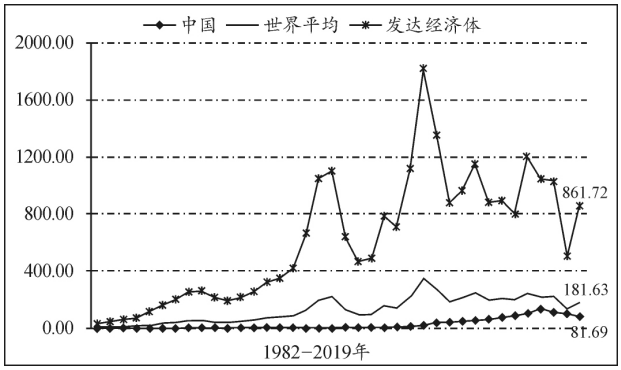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人均海外直接投资发展趋势比较
（流量额；单位：美元/人）
资料来源：联合国（UNCTAD）数据库。

以人均国民收入（GNI）作为衡量一国人均国民经济水平指标，以 ODI 流量净输出额（FDI 输出－FDI 输入）作为衡量一国净投资流出水平指标，采用核函数（kernel）估计拟合，可以得到人均 GNI 与净投资流出关系拟合曲线图。kernel 拟合的公式为：$\hat{f}(x_0)=\frac{\sum_{i=1}^{N}K_\lambda(x_0,x_i)\,y_i}{\sum_{i=1}^{N}K_\lambda(x_0,x_i)}$，其中 K_λ 是一种核函数，即 Epanechnikov quadratic kernel，可表示为 $K_\lambda(x_0,x)=$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D\left(\frac{|x-x_0|}{h_\lambda(x_0)}\right)$。

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人均GNI已达5000美元以上，2011年则超过40000美元，并随着人均GNI增长FDI净输出规模（ODI）在扩大，但是2012年以后，发达国家受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影响，FDI流量净输出（ODI）额处于有所波动下降状态，1970～2018年发达国家核函数（kernel）估计拟合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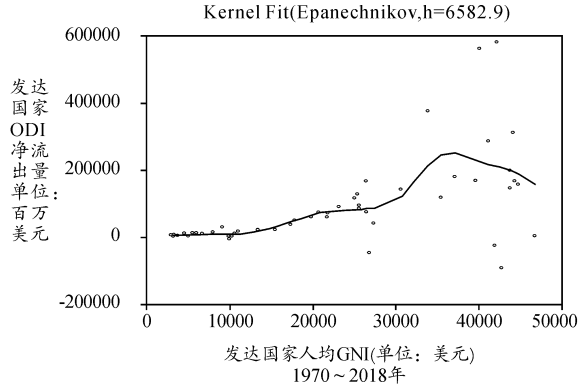


图2 发达国家ODI净流出量与人均GNI关系发展趋势

资料来源：联合国（UNCTAD）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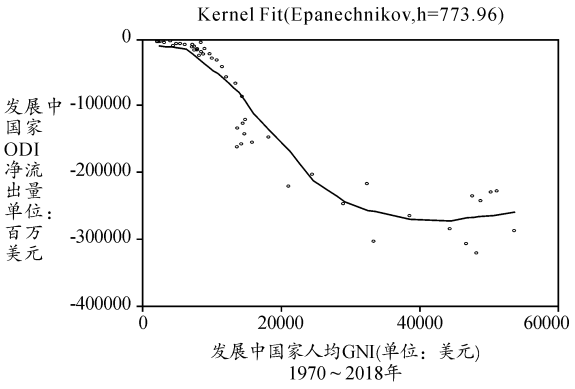


图3 发展中国家ODI净流出量与人均GNI关系发展趋势

资料来源：联合国（UNCTAD）数据库。

在世界海外直接投资历史上，发达国家长期占据垄断格局优势地位。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受自身经济实力的限制，海外直接投资流量占全球比重不高，且海外直接投资净流出额一直处于负值低位。

中国海外直接投资长期呈现出发展中国家的共性特征，在2005年之前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年流量额不足100亿美元，但在2008年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年流量额开始超过500亿美元，但随人均GNI的稳步提升，中国海外直接投资逐渐摆脱发展中国家的一般规律性特征，2011年以后呈现出海外直接投资流量大国的效应特征，2015～2018年海外直接投资年净流出额为正值。1982～2018年中国核函数（kernel）估计拟合如图4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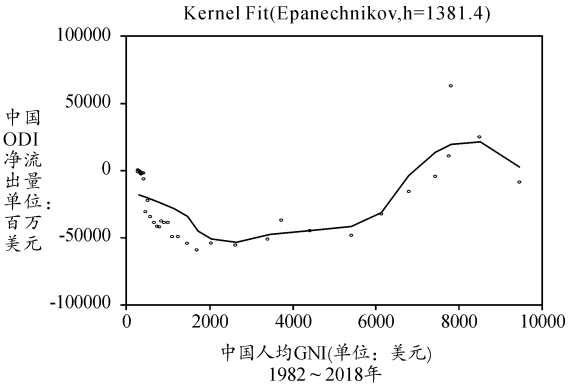


图4 中国ODI净流出量与人均GNI关系发展趋势

资料来源：联合国（UNCTAD）数据库。

根据这一经验性演变规律，若按照购买力平价折算，中国已是全球第二经济大国，2010年人均GNI为4428.02美元，2011年人均GNI按照当年汇率折算为5050美元，开始超过邓宁所划分的第三个阶段4750美元，2019年达到10410美元，至少应划入邓宁所划分的第三个阶段。

按照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以我国每年海外直接投资净流出额（NOI）作为因变量（1982～2019年），该变量可体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基本演变特征；以人均国民收入PGNI作为经济发展阶段的解释变量。考虑到因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可引入二次方程，计量回归方程设定如下：

$$NOI = \alpha + \beta(PGNI_t) + \lambda(PGNI_t)^2 + \varepsilon_t$$

其中t表示时间下标，a为常数项截矩，β和λ为自变量系数，PGNI和$(PGNI)^2$分别代表人均国民收入和人均国民收入的平方，ε_t代表随机误差。

运用最小二乘法（OLS）对模型的样本数据进行计量分析，运行结果如下：

表1 我国海外直接投资发展模型计量结果描述

	变量系数	标准差	t－统计值	Prob.
常数项	－15538.87	6058.354	－2.564867	0.0148
PGNI	－14.42687	4.740343	－3.043425	0.0044
$(PGNI)^2$	0.001880	0.000509	3.696073	0.0007
R^2	0.344885	因变量均值		－22427.82
R^2 调整值	0.307450	因变量标准差		26955.71
回归标准差	22432.44	AIC统计量		22.95006
残差平方和	1.76E＋10	施瓦兹准则值		23.07934
对数似然函数值	－433.0511	Durbin-Watson值		0.525059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根据回归建模参数，具体的拟合方程为:

$$NOI = -15538.87^{**} - 14.4269^{***}(PGNI_t) + 0.0019^{***}(PGNI_t)^2$$
$$(-2.5649) \quad (-3.0434) \quad (3.6961)$$

注: 括号中为 t 统计量。* 表示 10% 显著性，＊＊表示 5% 显著性，＊＊＊表示 1% 显著性。

从回归分析结果来看，调整后的 $R^2 = 0.3075$，说明计量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人均 GNI 及其二次项系数显著性通过 t 检验（Prob 值小于 0.01），显示了中国人均 GNI 的水平及其变化客观地解释了对外投资净流出额的变动。从拟合方程自变量系数的符号分析，一次项系数为负值，二次项系数为正值，说明拟合方程的系数描述特征与邓宁投资发展周期理论的“U”形曲线大致相吻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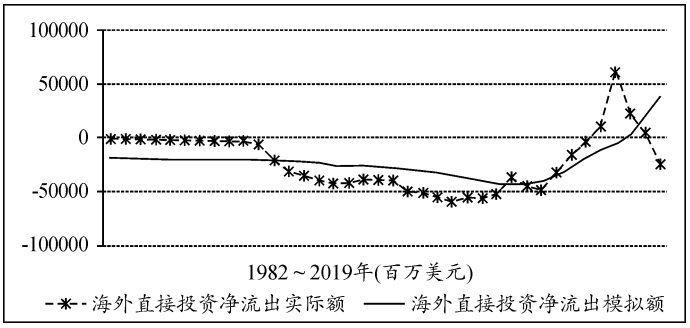


图 5 中国海外直接投资“U”型演变拟合曲线

总体而言，我国海外直接投资具有一些转型国家比如中东欧国家相似的 IDP 增长轨迹特点。[19] 从中长期发展前景来看，我国双向国际投资发展必然经历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转型过程，即在经过长期大幅度引进外国直接投资（FDI）的鼎盛期之后，将逐步迎来海外直接投资（ODI）的高潮。同时，也应科学应对国际经济复杂环境的严峻挑战，特别是我国海外直接投资流量额在 2016 年达到峰值后，在逆全球化的冲击下 2017～2019 年出现了连续下滑的情形，当前又面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当然，在海外投资宏观规制深化创新的政策背景下，我国海外净投资仍将会实现正值的稳健增长势头。

四、政策展望

客观而言，不管在战略规制层面，还是在规制促进措施方面，要有效支持我国海外直接投资，需进一步深化改革与创新海外投资规制政策。

1. 树立“投资全球”的国家规制战略

要全面树立“投资全球”的国家战略，从国家战略视野角度推进我国从商品贸易大国向海外投资大国转变，促进中国从全球生产中心向全球价值链投资辐射中心转型。进一步明确“投资全球”的战略行动计划，支持中国企业通过海外直接投资来延伸生产价值链、拓展国际化成长空间，以实现要素资源优化、技术进步和在全球分工中获得更大利益。可以日本为鉴，20 世纪 60 年代日本就逐步加快实施海外产业直接投资战略，进入 21 世纪，日本政府在《21 世纪展望》（2005 年）和《通商白皮书》（2006 年）中相继提出“投资立国”理念，强调要充分开展全球性的投资活动，真正实现“投资立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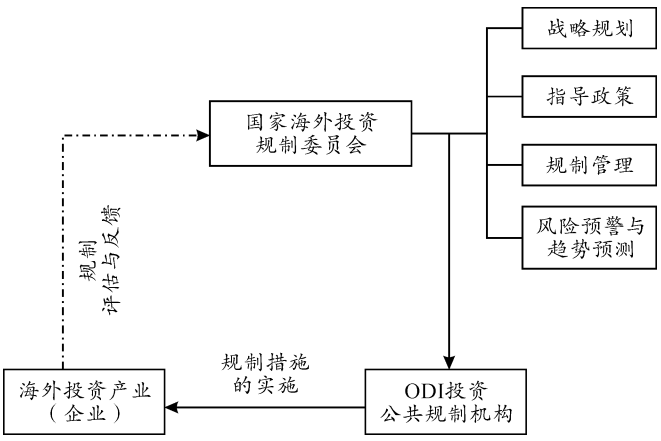


图 6 海外直接投资的国家规制机构决策体系

2. 完善海外直接投资的国家规制机构体系

目前，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国家公共规制机构不统一，职能分散在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等多个规制部门，这就造成了国家海外直接投资规制框架运行机制的效率低下。为此，我国应基于制衡性与独立性原则完善海外直接投资国家规制机构的顶层设计，明晰监管与保障体系。即进一步完善海外直接投资的规制主体，把海外直接投资管理机构从众多部门中分离出来，建立一个集战略规制、行政许可规制、监督管理和信息服务于一身的全国性统一协调管理机构——中国海外投资规制委员会。由该机构作为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政府规制主体，主要负责贯彻并制定国家有关海外直接投资的方针政策，做好战略规划，强化监督管理，制定指导原则，确保海外直接投资的各项活动按国家宏观规划健康有序地发展。此外，在海外直接投资的国家监管环节上，要发挥国家 ODI 投资规制机构的公共监管作用，相关政策及举措还需进一步完善。

3. 科学优化海外直接投资的国际产业链分工模式

从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来看，当前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在国际分工阶梯中总体上处于中游地位。根据小岛清的边际产业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扩张论，中国多数中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具有一定的比较禀赋优势，因此应加大这些富余生产力产业向发展中国家（地区）的海外转移力度；相对于位居全球价值链高端的发达国家而言，学习和赶超是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面临的主要任务。

“价值链延伸型”海外投资模式对中国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构建是非常重要的，现阶段尤其应鼓励制造业“价值链延伸型”海外投资。“价值链延伸型”的海外投资既符合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内在需求，又有利于我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中国可从“价值链延伸型”海外投资中获得长期增长动力，[20] 改变目前低附加值的粗放型发展模式，这将有助于促使中国企业从全球产业链的被动参与者逐渐转为主导者、创新者，从而使中国能够在全球生产与分工中获得更大的发展主动权。

4. 投资海外“战略性产业”应采取灵活的规制方式

目前全球各国尤其部分发达国家对能源、资源、敏感性高科技产业等“战略性产业”外资并购规制呈现日益审慎的规制导向。我国在投资海外“战略性产业”时，可以选择更加灵活的方式。具体包括：第一，在实施企业海外投资促进性规制措施的同时，适当淡化“国有”和“主权”色彩，可采取鼓励国有经济注资民营企业但不控股的办法，实现我国产业资本在海外的可持续布局。第二，在海外投资中不应过分追求母公司控股，为东道国企业预留一定的股权比例，可根据具体情况分步实施，逐步增加股权比例。第三，针对现阶段发达国家实施更为苛刻的 FDI 投资审查规制措施，我国企业在赴海外投资的过程中，特别是对发达国家的海外投资，应审慎选择海外投资的进入模式。以海外绿地投资为例，一旦决定采取绿地投资的方式，应针对绿地投资过程中可能面临东道国的各种规制风险制定有效预案。在有些发达国家 FDI 投资审查日益严格的规制背景下，也可鼓励国内企业与外国企业合资合作，共同实施海外项目的有序投资，力争形成海外投资的双赢局面。

5. 实施多元化空间规制布局战略

第一，加大对全球先进工业中心的战略性投资。我国在全球先进工业中心投资技术密集型产业，一方面，可以跟踪世界产业革新动态，更直接地学习利用发达工业国的先进技术和成熟经营管理理念，并向国内逆向传导和扩溢，推进我国产业综合竞争力提升；另一方面，可以利用东道国自身的产业链网络优势扩大生产，提高我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国际市场占有率。第二，基于“共商共建”规制战略理念，巩固和深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型直接投资。我国的纺织、服装、食品、家用电器、化工等劳动密集型和中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相对投资优势，这些国家（地区）也是“一带一路”沿线的经济战略合作密集区。同时，我国也应扩大对太平洋小岛屿国家、亚非内陆型国家、加勒比海地区等全球最不发达地区的投资。

6. 积极挖掘 WTO 的相关规制条款

WTO 的宗旨就是基于公平公正原则，突破逆全球化与保护主义的规制障碍，逐步实现国际投资的自由化，以达到全球资源优化配置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从总体上看，加入 WTO 使我国能在全球公平性原则下直接参与国际投资规则的决策过程，大大增加我国在国际投资发展领域的发言权和主动权。在海外直接投资方面，我国可利用 WTO 正式成员国的地位，积极运用基于 WTO 框架下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WTO 金融服务协议》等全球性投资合作规制机制，争取更好的海外投资政策环境，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助推我国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 Lecraw，Donald J，. Direct Investment by Firms from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J]. Oxford Economic Paper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29（03）：442－457.

[2] Lall，Sanjaya. The Emergence of Third World Multinationals：Indian Joint Ventures Overseas [J]. World Development，Elsevier，1982，10（02）：127－146.

[3] Andreff，W. The Newly Emerging TNCs from Economies in Transition：A Comparison with Third World Outward FDI [J].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2003，12（02）：73－118.

[4] Nagesh Kumar. Foreign Capital Flows and Development：Lessons from South Asian Experiences，in Raghabendra Jha [R]. Routledge Handbook of South Asian Economies，Routledge，London and New York，2011. 238－257.

[5] Buckley P J，Clegg J，Cross A，el at，Voss，H. and Liu，X.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7，38（04）：499－518.

[6] Morck R，Yeung B，Zhao M. Perspectives on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8，39（03）：337－350.

[7] Davies K.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rom China and Its Policy Context [J].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Review，2010，2（04）：102－115.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8] Carlos RodrÃguez，Ricardo Bustillo. A Critical Revision of the Empirical Literature on Chinese Outward Investment: A New Proposal [J]. Panoeconomicus，Savez ekonomista Vojvodine，Novi Sad，Serbia，2011，58 (05): 715 - 733.

[9] Karl P. Sauvant & Victor Zitian Chen. China's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R]. EABER Working Papers 23749，East Asian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2013.

[10] Pencea S，Oehler-Incai I M. Chinese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A Romanian Perspective [J]. Romanian Economic Business Review，2014，9 (02): 45 - 72.

[11] Buckley P J，Clegg L J，Voss H，et al. A Retrospective and Agenda for Future Research on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18，49 (01): 4 - 23.

[12] 谢 岷. 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企业的生产国际化 [J]. 世界经济，1987，(10): 34 - 39.

[13] 鲁 桐. 中国企业跨国经营战略 [M].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 181 - 195.

[14] 金 芳. 中国国际直接投资地位上升中的失衡特征及其纠正 [J]. 世界经济研究，2016，(02): 69 - 77.

[15] 李洪亚，董建功. 所有制改革与 OFDI: 中国的证据 [J]. 世界经济研究，2017，(02): 62 - 77.

[16] 李 琛，赵 军，李喜洲. 财政分权、政府行为与对外直接投资: 抑制还是促进 [J]. 财政研究，2019，(05): 77 - 91.

[17] Dunning，J. H. Explaining the 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Position of Countries: Towards a Dynamic or Developmental Approach [J].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1981，117 (01): 30 - 64.

[18] Dunning，J. H. The Investment Development Cycle Revisited [J].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1986，122 (04): 667 - 676.

[19] Gorynia M，Nowak J，Wolniak 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and the 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 Revisited [J]. Eastern 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2010，1 (02): 21 - 36.

[20] 杨连星，罗玉辉.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全球价值链升级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7，(06): 54 - 70.

China's Overseas Direct Investment: Regulation Evolutionary Characteristics and Policy Prospects

LONG Xiao-bai[1] YANG Li[2]

(1.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Jiangx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Nanchang 330077，China;
2.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Beijing 100037，China)

Abstract: As a big developing country，China's open regulatory policy is the institutional endowment support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overseas direct investment (ODI).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China's overseas direct investment (ODI) regulation has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of evolution，namely，the regulatory paradigm has gradually evolved from restrictive regulation，convenient regulation to encouraging regulation. This paper also makes an objective judgment on the development stage of China's overseas direct investment (ODI). Through research and analysis，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ODI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re roughly similar to the "U" curve of Dunning's investment development cycle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dium and long - term development prospects，China's overseas direct investment is bound to experience a transformation process up to higher stage. In view of the new situation of global economy，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cientific countermeasures，such as establishing the national regulation strategy of "investing in the world"，improving the national regulation system of overseas direct investment，and implementing the strategy of diversified spatial regulation layout.

Key Words: ODI; home country regulation;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development outlook

责任编辑: 曹羽茂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